



Pour Le Mercredi Seconde Leçon



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

□ 卓新平

基督宗教的音乐传入中国,按已知史料考证,最早可以追溯到8世纪唐代景教盛行时期。在现存景教文献中有作于8世纪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和《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前者作为景教赞美诗歌词乃中国最早的基督宗教赞美诗,按其“无上诸天深敬叹,大地重念普安和”之歌词,此即《荣归主颂》(Gloria in Excelsis)的最早中译文,中国教会在1936年出版《普天颂赞》时曾将之放在第二首,现亦收入《赞美诗新编》之中;后者作为景教赞美诗歌词则是景教用于耶稣显圣容日的颂辞,其经文根据《马太福音》17章1至9节,故有“敬礼大圣慈父阿罗诃,皎皎玉容如日月,巍巍功德超凡圣”之表述。景教在唐武宗时遭禁后,匿于道教的景教徒亦曾将景教赞美诗影响道教经文,如道教吕祖派所传《救劫证道经咒》中

即杂有景教叙利亚文赞美诗歌词汉文音译的段落。此外,唐代传入日本的“越殿乐”、唐代诗人卢纶的《慈恩寺石磬歌》等,也被认为存有受景教音乐影响之痕迹。

元朝时期,随着景教在中国内地的复活和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基督宗教音乐对中国的影响得以再现。在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传教士的东行纪中均有天主教赞美诗在华流唱的最早记载。而来华第一位天主教主教孟高维诺在其14世纪初的书信中更是自述了他翻译《诗篇》及《圣歌》30首,其收养诸童中已有11人知悉祭圣乐曲等情况。此外,在新疆高昌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祈祷书片段被认为是元代景教“处女玛利亚赞美诗”歌词抄本,而在北京午门城楼上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前后唱咏歌词抄本亦被鉴定为元代景教礼拜仪式使

用的赞美诗。

明末利玛窦等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开始了近代西乐东传的历史。1601年初利玛窦一行到达北京，曾向皇帝贡献欧洲古钢琴（“西琴一张”），并应宫中太监之邀作《西琴曲意》，讲授西洋音乐，由此使基督宗教音乐传入明朝皇宫。据考证，利玛窦用汉文撰写的《西琴曲意》八章是明清最早中译的天主教赞美诗歌词。此后，毕方济、艾儒略、卢安德等传教士在北京、福建等地传教，亦将基督宗教音乐及其器乐演奏技巧传入中国。至明末崇祯十三年（1640年），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宫廷珍宝库偶然发现利玛窦所献西琴，引起崇祯帝的兴趣，据传“汤神父就上钢琴奏了一曲，又讲了几帧像的意思，见皇上听得颇有兴味，就奉上一个乌木匣，匣中藏的，是一座蜡制的三王朝主像，皇上听了音乐接过像匣，非常满意”（陶亚兵著《中西音乐交流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第60页），遂令汤若望修琴制琴，而汤若望借此机会亦将琴座上利玛窦当年书写之西文译出，即《诗篇》第150首第5节和第149首第3节。

清初基督宗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始于汤若望。1652年，宣武门天主教新堂（“南堂”）在其督建下落成，堂内所装置的管风琴乃北京拥有这种教堂乐器之始，故此京城出现“天主堂开天籁齐，钟鸣琴响自高低”的景观。康熙年间，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德理格等人先后给康熙帝讲解西洋音乐，其中徐日升在担任宫廷音乐教师期间曾给宣武门天主堂重装了一座更大的管风琴，并撰写了西洋乐理著作《律吕纂要》，而德理格则“修造新书”，留下了中国刊行的第一部汉文西洋乐理著作《律吕正义·续编》、创作了《小提琴奏鸣曲集》。此外，清代天主教神甫吴渔山创作了《天乐正音谱》，共有南

北曲九套、拟古乐歌二十章，其内容即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和古歌填词而成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这是迄今所知道的中国人自己创作最早的、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规模较大的弥撒和赞美诗歌词。吴渔山收入《墨井集》的赞美诗歌词《仰止歌》亦采用仄起七律吟诗调，此词在1920年被配以中国传统乐曲“云淡”，1936年刊印在《普天颂赞》中为其第30首，1983年又被收入《赞美诗新编》，为第386首。可以说，吴渔山乃创作天主教音乐歌词的第一个中国人。

基督教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则始于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的东来。他到广州后因不能公开、直接传教而转入译经、编书活动，并于1818年编译了基督教来华后的第一本中文赞美诗《养心神诗》。这一诗集共27页，收有赞美诗30首，首印300册，对中国基督教赞美诗的编译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马礼逊以此集而在华开了将“赞美诗”（Hymn）汉译为“神诗”的先河，此后基督教来华初期编辑的不少赞美诗集都将这种表述作为标准译法。

鸦片战争以来，基督教音乐在华影响愈亦扩大。1840年，麦都思模仿马礼逊编译赞美诗集，收有赞美诗71首，共46页，亦取名为《养心神诗》。1851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霖在华编译赞美诗集《神诗合选》，收有赞美诗68首，共30页。1852年，长老会传教士养威廉在厦门编译出版《养心神





诗》，收有13首赞美诗，共10页。这本小集后不断增补再版，成为1934年基督教闽南大会编修的《闽南圣诗》之前身。基督教赞美诗与天主教赞美诗在汉译上的一大不同，就是完全采用汉文翻译歌词，而不用汉字为拉丁文注音的方法。而且，基督教还采用地方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来翻译赞美诗歌词，如养威廉曾用罗马字母拼写闽南话的方法来拼写赞美诗歌词，宾为霖亦用汕头方言编译了《潮腔神诗》、用福州方言编译了《榕腔神诗》和用厦门方言编译了《厦腔神诗》等。19世纪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编译的赞美诗集还包括麦卡地编《麦卡地赞美诗》、蓝克勒用文言所编《养心神诗》、马丁用罗马拼音注宁波语所编《圣诗集》等。

基督教圣诗乐谱、乐法在这一时期亦传入中国。1861年刊行的天主教《圣事歌经简要》传入了四线谱，而英国基督教耶稣圣会女传教士狄就烈（狄考文之妻）则于1872年编著刊行《圣诗谱·附乐法启蒙》，传入符号五线谱并介绍以这种谱式记谱的赞美诗。此外，李提摩太夫妇曾以字母谱教中国人唱赞美诗，美国基督教传教士都春圃亦曾在1898年再版的《颂主诗歌》集前讲述字母谱识谱方法、“指明新法之规矩法则”。《颂主诗歌》即一部以字母谱刻印的四声部赞美诗集，收有400多首基督教歌曲，于1895年在北京初版。还有一些基督教传教士则深入到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用简化的拉丁字母等为当地民族语言注音，并用作赞美诗乐谱的音符。在这种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赞美诗中国化”的发展。

中国基督教徒参与编译赞美诗的工作始于第一位中国基督教牧师梁发，他曾于1816年左右在马六甲编著布道小册子《救世录撮要略解》，其中收有3首赞美诗。而中国基督教徒自己创作赞美诗曲调，则以席胜魔为第一人。他于1883年创作的《我们这次聚会有个缘故》乃中国赞美诗创作之开端。1912年基督教内地会将席胜魔创作的诗歌结集出版，题为《席胜魔诗歌》，收其创作的76首歌词。这些赞美诗曲谱大都采用民歌曲调调式，体现出浓郁的山西地方民歌风格。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基督教音乐亦得到发展。受基督教礼仪音乐的影响，在其集会和礼拜上歌唱赞美诗乃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宗教仪式中必需的组成部分。其《天条书》以行政法令的方式规定“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这些赞美颂辞被太平天国作为其《赞美颂》而流传，麦都思等人所编译的《养心神诗》，以及罗孝全在广州传教时自创的《三一颂》等则被太平天国作为《赞美诗》而广为应用。

进入20世纪以来，基督教音乐的“中国化”有了较快发展。中国基督教神学家赵紫宸曾与美国基督教音乐家范天祥合著了一本《民众圣歌集》，“负责歌词创作的赵紫宸采用古诗词如浪淘沙、花月吟、如梦令等词牌结构，有的模仿民谣风格，因此唱起来亲切、上口；负责选曲的范天祥则收集了许多中国民歌作为圣歌的主旋律，再配以四部和声。”（田青主编：《中国宗教音乐》，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182页。）1936年，中国基督教会编辑出版了为中国人通用的赞美诗集《普天颂赞》，由杨荫浏、刘廷芳、范天祥等人共同担任编委。这本赞美诗集共收集512首诗歌，其中包括用中国民间曲调加以改编和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赞美诗72首。1983年，中国基督教协会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又编辑出版了《赞美诗（新编）》，新编赞美诗集共收入400首赞美诗，其中有102首为中国基督徒写词谱曲或采用中国风格曲调的赞美诗，有56首是近年来中国基督徒的新创作。此外，南京金陵神学院还办有不定期刊物《圣歌选集》，刊登中国基督徒的大量圣乐新作。这样，基督教音乐在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 田悦阳